

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战略空运*

牛大勇

档案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风气的演进，某些历史性战略决策的内情，被当事人陆续而零散地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侥幸流露出来的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展开研究。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抗战受降之际，毛泽东借助美国飞行员之手实施的一次战略性的空运行动，对尔后中国两个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为后人研讨在历史转折关头应如何捕捉机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本文拟将口述史料同档案文献相结合，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一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并两次实施原子弹轰炸。苏、蒙军队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政府8月15日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法西斯持续苦战了14年之久的中国来说，最后的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有些出乎意外。无论是担负着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坚持着敌后抗战的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亟需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收胜利果实，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危机。

国民党战场的机动力量，此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他们刚刚在那里经受了数万日军的一次进攻狂潮，正准备实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制定的“黑色金刚石计划”，打算在8、9月间，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一次局部反攻，争取夺得一个出海口。¹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的漫长战线上，等待着抵抗日军的下一次进攻。全面的战略反攻，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

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自1940年末的百团大战后，

*本文曾以《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此后有若干报刊发表抄袭本文的文章，经发现后曾受到作者的法律追究。本次重新发表，作者仅对原作略有文字修订，题目改回1995年初投稿时的原题。

¹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1958, pp. 332, 337.

便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将主力化整为零，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再进行大兵团作战。至 1945 年春夏，中共各解放区的部队，分别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²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自 1943 年起，大部分已陆续奉调离开前线，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 年 6 月，中共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估计，距日寇崩溃尚有一年多时间，因此将他们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开会，没有立即派回前线。³

当 8 月中旬日本迅速败降时，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辽阔富饶的东北地区，也面临苏联红军撤走时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之消长，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共两党立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中共中央 10 日指示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指国民党军——引者）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⁴ 10 日至 11 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调动部队向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进军。⁵ 毛泽东 13 日向聚集在延安的干部们阐明了时局和方针：“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⁶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8 月 11 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问题。旋即电令国民党各战区：“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⁷ 但同一天，蒋介石却电令朱德等中共将领：“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⁸ 他还命令沦陷区的“地下军”和伪军：“须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⁹ 8 月 23 日，何应钦在芷江把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第一个备忘录，交给前来洽降的日军使节今井武夫，其中特别要求冈村命令所属各部：“应立即在各自之原驻地及指定地点待命，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之部队指挥官，不得解除日本陆海空军之投降武装及交出占领地区以及分让物资。”日方当即提出：“中共军想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

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下简称《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第 489~476 页。

³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第 95 页；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第 293 页；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 209 页。

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115 页。

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116~122 页。

⁶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1126 页。

⁷ 《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12 日，第 2 版。

⁸ 《大公报》1945 年 8 月 13 日，第 2 版。

⁹ 《大公报》1945 年 8 月 13 日，第 2 版。

为了自卫，日军决定对此采取断然处置。”国民党方面答复：“除受命于何应钦总司令者外，可一律视为土匪，日本军对他们即使采取自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¹⁰ 经过日蒋之间如此一番“洽降”，中共的对日受降权利，就被完全排除了。

二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在华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产生微妙的影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是大力支持和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但其政策的另一界限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¹¹

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它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它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¹² 这就留出了一个例外的口子。

美国决策人似乎认为，支持“国军”抢占要地，与不支持它打内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尽管国共双方对此都持相反的看法。不过，美国军方留下的那个口子，说明它尚未绝对排除在军事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某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魏德迈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但他坚信，援助“国军”抢占战略要地，是自己当前的崇高使命，而运用美国的飞机、舰船、汽车抢运“国军”，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唯一可行办法”。即使这意味着被美国运到各要地的“国军”将士，将向已包围或占领了那些地方的中共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¹³ 他迅速调集美国空军第十和十四航空队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从8月26日开始，先后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先遣人员。9月5日、6

¹⁰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日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4，第78~80页。

¹¹ Keith E. Eiler: *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7, p. 135.

¹²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5, Vol.7, p.516. 关于书名，笔者认为，“foreign relations (对外关系)”比“diplomacy (外交)”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而且英文为复数，此丛书原副标题“*Diplomatic Papers*”，也是复数，译为《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比较贴切。我国较多学者将书名简译为《美国外交文件》，似不妥贴。

¹³ *FRUS*, 1945, Vol.7, pp. 531~533.

日开始将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九十四军分别从芷江、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10月中旬，又将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分别从汉口、上海空运到北平、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9月30日在大沽登陆，进占天津、北平、秦皇岛。10月10日又有美军在青岛登陆。此后，美国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同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¹⁴

暂时看来，蒋介石在美日的积极配合下，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抢到手了。中共被迫放弃了原订的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计划。¹⁵ 魏德迈似乎有理由夸耀，这次援蒋大空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¹⁶ 但他又自称在执行援助中国受降的任务时，“也许是无意中为中央政府打败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直接的美援”。¹⁷ 这话则未免有些遮遮掩掩。如前所述，他完全是在意识到如此执行美国政策将给中共造成什么危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历史的讽刺性在于，如果把这句话改为说，他手下的美国军事人员“也许是无意中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一次直接的援助”，此说或许可以成立。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无意中”的援助，才使成千上万乘坐美国运输工具赶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最终变成悲剧角色。而魏德迈引以为豪的那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注定成为徒劳之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美外交保持了适当的灵活性，因此得以机敏地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偶然机遇。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早在4月2日即于华盛顿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国的任何军阀或武装政党”。¹⁸ 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的判断是：“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给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¹⁹ 中共决定公开批评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以期促使它有所改正。²⁰

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区别对待”的对美策略：“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²¹ 这里提出的第二点区别其实很有实用价值。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连续撰文，严厉抨击美国政策，但时局的突变，使

¹⁴ *FRUS*, 1945, Vol.7 p. 54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86页；《申报》1945年8月28日，8月31日，9月7日，第1版；《大公报》1945年8月28日、9月10日、10月1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8日、10月19日、10月31日、11月1日，第2版。

¹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23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2~4页。

¹⁶ *Report by Wedemeyer to Eisenhower*, February 1946. CBI Theater, Historical Section: See also HISTORY OF THE CHIHA THEATER, Manuscripts in the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ol. 2, Chap. 13.

¹⁷ *FRUS*, 1945, Vol. 7, p. 533.

¹⁸ *FRUS*, 1945, Vol. 7, p.319.

¹⁹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5年6月2日。

²⁰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5年6月2日；《中央对美政策》，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告时局方针》，1945年6月18日。

²¹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02~1103页。

他感到有必要保持对美政策的灵活性，以便使中共有余地寻求某种战略利益。

中共中央 8 月 11 日决定：根据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恢复搁置已久的国共谈判，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取缓和态度，继续救护美国被难人员，准备配合美军在中共解放区所及的沿海登陆，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中央也提醒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在华充当镇压希腊共产党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英军将领斯科比（General Scobie）那种角色的可能性要保持高度警惕。²²

日本投降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认为，如果能经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即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仍不能兑现，也可以使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²³

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3 日议决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²⁴

毛泽东不想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原因之一，是他深知这很可能是一个“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的过程。而对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共来说，必须立足于“打”，因为“能打才能谈”。但其立足于“打”的必要准备工作，尚有关键一环没有解决，所以要去重庆谈判就令人不放心。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即将向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谈判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是最中心的一条。要使对方接受这些条件，很可能要在那个打打谈谈的过程中，能够打疼对方。所以中共必须在对手面前，造成一个内战不那么好打的态势，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²⁵

毛泽东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²⁶ 要使自己的部队迅速完成从现有的分散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猛烈扩大解放区，迎击来犯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帅抢先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此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动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²⁷

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在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²⁸

早在 1944 年末，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筑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

²²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第 124~125 页。

²³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52~1166 页。

²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第 180~181 页。

²⁵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 324~325 页。

²⁶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526 页。

²⁷ 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 年 12 月 6 日、28 日。

²⁸ 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 年 12 月 6 日、28 日。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回后方。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军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²⁹ 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英的这个提议，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需要再请示一下更了解此时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部门。³⁰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忙忙地赶到延安东关机场。据四十年后若干当事者的回忆透露，这些人是：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张际春、江华、聂鹤亭、邓克明。³¹

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这些将帅当时都奉命要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同行。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飞机者都要带降落伞。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将要共乘一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吃了一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无法同美国驾驶员沟通，将非常危险，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黄华也加入了这批冒险者的行列。³²

人们在机场上合影留念后，开始告别。这是一架破旧的军用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一下，机舱矮小而呈弧形，人们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伸不直腰，抬不起头。这些都给乘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³³

9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带上了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是生平第一次乘飞机。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的重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³⁴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着紧张和担忧的气氛。谁都明白，如果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后，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³⁵

²⁹ 李棣华：《建国前外事工作的片断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第161页。

³⁰ 据美国军队条例，美军观察组有权调用个别飞机，无需请示上级部门。迄未发现关于这次飞行的档案记录。

³¹ 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98页；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第2页。

³² 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97~298页；章百家向笔者转述黄华答问的电话记录，1991年6月11日，1992年2月23日。

³³ 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97~298页；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第3页。

³⁴ 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97~298页；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第3页。

³⁵ 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年12月28日；《立三致军委电》，1945年8月25日。

在此之后，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安排，和周恩来同赴重庆。³⁶

那架飞机在长凝机场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头赶赴各自预定之战区。³⁷就这样，美军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转运任务，其时间比魏德迈开始空运国民党军先遣人员去“受降”，还要早一天。

四

了解这批将帅在随即到来的国共决战、抗美援朝以至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人，自能理解这次空运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里只对其造成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影响略加评析。

中共晋冀鲁豫战区地处华北战略要冲，扼守着国民党军北进的门户，威胁着津浦、平汉、正太、同蒲四条干线，号称“四战之地”。美军飞机给中共这个战略要冲空运来的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统帅部。邓小平是该区党委书记兼军队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滕代远是副司令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8月25日飞抵山西黎城，27日便赶到了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司令部开会，拟定了上党、平汉两战役计划。随即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整编为4个野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分任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也在随后组建的另一支主力纵队中指挥作战。³⁸这些从天而降的“飞将军”，经过紧张而短促的准备，即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上党、平汉两个战役，共歼灭北进的国民党军6万余人。按照中共中央的评价：“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³⁹

在一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率先揭开中共对国民党战略反攻的序幕。他们和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旌旗所向，云贵川藏。杨得志所部则为攻略华北、西北的主力之一。

被美机运到前方的另一批将帅，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同样扮演了决定历史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人，成为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将。他们10月下旬赶到东北后，对于及时调整那里的原定战略方针，夺取战争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⁴⁰他们的大军后来依次席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松花江直下海南岛。

陈毅任中共华东战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傅秋涛是他麾下的战将。他

³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1页；对毛泽东8月25日决定和周恩来同机赴重庆的其他原因的详细说明，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17页。

³⁷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第326页；江华：《追忆与思考》，第212页；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99~301页。

³⁸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第490、500~507页。

³⁹《战史》第3卷，第14~18页；《滕代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301页。

⁴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7~148、176~177、201~210、218~223、249~252页；《中央关于目前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袁伟《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第3、4、16~26、184~200、116~111页；戈福录等编《东北战场风云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第13页。

们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就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使国民党军长期不能利用这段铁路发挥自己的机械化优势。⁴¹ 陈毅更重要的作用，是以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老资格，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这条铁路开向华北和东北，掩护了山东和苏北的中共军队进取东北的战略调动，并为华东中共军队今后的大范围机动作战和实施大规模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⁴² 华东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也是被歼人数最多的地区。⁴³

顺便指出，中共在此历史关头，巧借美军之手获取如此重要的战略服务，绝非仅此一次。大约在9月9日，另一架C-46型美军飞机，把中共晋察冀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又一批将帅，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这个飞抵前线的战区统帅部，立即采取行动，指挥所部在两个月内解放中小城镇60余座，将主力整编为9个纵队20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在那里很快发展成10万之众。⁴⁴ 这批将帅对华北、东北的战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杨得志、陈赓、宋时轮、王近山、郑维山等将领，曾经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等要职，是对美军作战的主将。聂荣臻在此期间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肩负着指导战争的中国最高统帅部枢要重任。⁴⁵

五

当然，1945年8月25日那天，美军观察组人员不可能预料这次偶然的飞行，对今后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同样，任何历史学家至今也很难断言，那天叶剑英（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毛泽东等中共决策人）的那种可怕的担心，万一不幸而成为现实，一部现代中国历史，又将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当时面临的紧急形势来看，毛泽东等人认为，即使冒这样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确实，让这么多高级将帅，共乘一架宿敌之友的飞机，实为世所仅见的大胆之举。在次年遭遇“四八空难”，一下丧失了秦邦宪、王若飞、叶挺、邓发等重要领导人之后，中共绝不肯再冒这类的风险了。然而，“八二五空运”所获得的战略利益，还是应记入史册，供人寻味。

从延安到黎城，相距800多公里，要经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

⁴¹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327页；《战史》第9卷，第20~21页。

⁴² 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13~114页。

⁴³ 《战史》第9卷附件：重要战役一览表。

⁴⁴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第587~614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第5页；这次飞行的日期，说法不一，待考。

⁴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附件1，第1~3、7~12、16~22页。

还要冒险穿越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人们在多数地方不能走大路，只能绕行崎岖小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河南濮阳来延安，走了70多天。⁴⁶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走了半年。⁴⁷依此推算，单单从延安到黎城，就大约需要走2个月。将领们固然可以在某些地段骑马代步，但行进速度仍要由步行护送的普通士兵们来决定。这就是说，除去对长途跋涉积累的疲劳必须加以休整，和其他难以估量的影响行程的因素不计，若不借助美军的飞机，中共华北、华东、东北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至少要迟两个月才能赶到自己的阵地。谁都明白，在日本投降、国共竞相夺机争做战略展开之际，这两个月的延误意味着什么。

应该承认，如果这些富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和指挥权威，并由毛主席、党中央面授机宜的将帅，未能及时赶到前线实施指挥，很多重大部署是不能很好贯彻落实的，一些关键性的转变甚至难以发生。这次空运，帮助中共的这些主要将帅先敌一步到达战区，贯彻中央指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建设指挥机构，先敌展开，争取到选择和预备战场的主动权。一系列的重要战略措施遂得以顺利落实，进一步完成了从分散游击到集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先机之利，惠莫大焉。

笔者无意论证某次空运之有无或成败，便能对中国前途和命运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认为中共在这个历史关头，若不借用美国飞机，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大决战的最后胜利。但研究至此，不能不指出：中共中央由于实行对美国“区别对待”的政策，得以成功地借力于美军“普通工作人员”，确实取得了实际效果，构成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这次空运的战略重要性、政策背景和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也许它从来没有机会，能以如此之小的动作，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见，此事若在当时甚至以后许多年内被披露，那会给美国政坛和美蒋关系带来何等强烈的震撼！

⁴⁶杨得志：《横戈马上》，第289页；江华：《追忆与思考》，第203页。

⁴⁷《滕代远传》，第300~305页；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第4页。